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及最新趋势

阿得兰提·阿得泊鞠

引言

历史、经济、民族和政治上的联系,导致并强化了非洲地区内、地区间、国家间以及非洲与其殖民宗主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人口迁移。目前非洲的移民潮以地区内流动工人、无证非法移民、游牧民、边境工人和难民为主,高技术专业人员也越来越多。各种移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种族背景相当复杂。由于共同的文化、语言和殖民经历,东、西部非洲非法越境行为相当普遍,加之边境劳工流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内迁移与国际迁移、正常迁移与非正常迁移,难以截然分清。

人口、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加上经济增长的停滞不前,加剧了贫困和失业。目前该地区劳动力以每年 2.7% 的速率增长,至少需要新增 750 万个工作岗位,才能保持就业局势的稳定。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自 1980 年代开始呈负增长;GDP 原地踏步,人口每年却要增长 3%,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 1/4。由于这个原因,该做

的事情没有做成,甚至此前几十年的积累也坐吃山空,于是有人称 80 年代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失败的十年”(Adepoju, 1996)。贫困愈演愈烈,绝大多数非洲人生活水平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现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那里的人在 80 年代末期比那个 10 年开始的时候更穷 (United Nations, 1996)。迁移,不管是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一国之都,还是从一个国家到该地区之内或之外的另一个国家,基本上是一组因素的产物——机会在前面拉,赤贫在后面推。

非洲各国政府被迫通过退休、裁员和压缩编制等手段缩减公共部门——最

大的就业部门;私营部门也纷纷效颦。例如,尼日利亚对公职招聘——最大的雇主——的禁令,可能快要解除了。这禁令弄得全国 50 多所大学和技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只能无望地在街头闲逛。私营部门的生产力只得上 27%,也只有大量减员。由于内战和政治、经济管理不当,非洲国内经济一片混乱,当政治、经济和环境条件滑落

阿得兰提·阿得泊鞠 (Aderanti Adepoju) 是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为尼日利亚伊费和拉各斯数所大学、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及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工作,并在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任顾问,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项目 (MOST) 移民研究网络非洲协调员、尼日利亚拉各斯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他就非洲的人口与发展、移民、难民等问题发表过大量论著。
Email: aadepoju @infoweb. abs. net

到某一临界线以下,非洲人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呆不住了,只好远走他乡。

因冲突而起的政治动荡是造成该地区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政局不稳,前景难以预料,危机一触即发。独裁政权经常打击、迫害、压制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会领袖,导致专业人员和和其他人员外流。在前途未卜的民主化进程中,政府丧失了能力,国家摇摇欲坠,结构调整计划首鼠两端,人们失去保障,这些因素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迁移,包括难民(Adekanye,1998)。

过去20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上演着一幕幕两败俱伤的战争悲剧,产生了大批难民。1969—1990年间,载入世界史册的43次内战有17次发生在非洲,包括安哥拉、利比里亚和莫桑比克发生的“非常激烈的”内战(Schmeidl,1996)。民族矛盾显然是苏丹、索马里、塞拉利昂、卢旺达、布隆迪等国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冲突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难民。各民族争夺资源和政治权力,争端由此而起,导致了一系列后果,包括人口外流、国内流动和流亡。卢旺达争端的起因就是权力和土地的分配,土地在卢旺达是一种奇缺资源。而这一切背后,是人口对日益贫瘠的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卢旺达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农民手里仅有一点零星薄地,工作不稳定,收入又低,他们只好给别人打工,或者进城做农业以外的事情。城里的工作机会固然也不多,但这里的教育设施可使移民子弟——将来主要的潜在外流人口——受益匪浅。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外来移民却有增无减,这也是一个原因。

人口激增、政局不稳、民族矛盾上升、经济持续低靡、严重的贫困和日益恶化的生态条件,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际移民的趋向和模式。那里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使得原来的移民接收国转而成为移民输出国。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的资料总是支离破碎,很不完整。该地区最主要的迁移形式——偷渡和跨国劳工移民——总是难以追踪,这也说明我们须努力从多种渠道获取数据。例如,关于高技能专业人员迁移的资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不如在北方移民迁入国那样容易获得。其实许多国家在这里的大使馆都有此类移民的档案,其中就有相关信息。将这些资料来源与人口普查以及移民专项调查结合起来,就能在相当程度上丰富我们对这些迁移的了解。

迁移的主要趋势和问题

迁移模式的变化,尤其是非正常迁移、非法移民以及贩卖人口现象的增加,可归因于贫困以及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和就业形势。人口的急速增长和失业严重阻碍了该地区的发展进程,而成为引发移民的条件。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迅速恶化,未来前景黯淡,人们纷纷向国外迁移。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许多非洲人来说,极度贫困的推动力和北方国家优越生活条件的吸引力同样大(Adepoju,1995b)。

作为家庭生存策略的迁移 迁移在非洲向来是“家庭事件”,现在更是如此,连没有迁移的成员也密切参与其中,并受迁移进程的影响。一家人为了生存,会竭尽全力帮助一个或多个成员加入劳动力迁移之类的系统中去,希望这些迁移者与留在老家的人保持密切联系,不时回家看看,经常给家里寄点钱。家庭也对其成员——通常是长子,从小就教他为这类迁移做好准备

——进行教育投资,希望从中得到回报。出去的人觉得自己必须把很大一部分收入寄回家,养活留在老家的人。汇款是许多家庭维持生存、支付其他开支的生命线。在塞内加尔等资源贫乏的国家进行的家庭预算调查表明,家庭对外迁和汇款的依赖非常大:30%—70%甚至80%的家庭开销需要靠出去的人寄钱回来支付(ILO, 1995)。南非共和国专门为从莱索托招聘的矿工实施了延期支付的办法,怕是这方面最著名的范例。马里(Findley et al., 1995)和布基纳法索(Cordell et al., 1996)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尤其是移民家庭,非常需要移民们的汇款,因此政府就鼓励这类劳工移民。

家庭有选择地资助迁移,以缓解结构调整计划带来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移民们要支援家里那些境况更差的成员,负担非常沉重。家庭既要满足其成员眼前生存的物质需要,又要给他们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在罗网中苦苦挣扎,越陷越深(Findley, 1997)。有些国家在实行经济复苏一揽子计划和调整措施的过程中,遭遇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些国家把在业人员的工资降低了15%—75%。政府纷纷通过退休、裁员等手段精简公共部门——这是最大的就业部门,私营部门紧随其后。于是家庭的支柱纷纷丢了工作,加入了已然庞大的失业青年的队伍(Adepoju, 1996)。工资冻结和取消社会福利补贴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各部门全面裁员,各家各户都得不到足够的工作以养家糊口。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迁移就成了应付困境的最后一招。

女性移民增加 非洲过去参与长期、远程迁移的主要是男性,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进来。从传说的情形看,过去是

男子四处奔波找工作挣钱,女子留在家里,而现在女性移民越来越多了。很多妇女的迁移是独立的,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需要,而不再仅仅以丈夫或家庭其他成员为转移(Adepoju, 1997)。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限制妇女获得贷款、拥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严重妨害了妇女的自主和自我实现。就在最近,津巴布韦最高法庭还做了一项可笑的规定,妇女“在家庭里不得算作成人,只可算作‘未成年男子’”(The Guardian Newspaper, Lagos, 31, August, 1999)。传统的政治结构没有给妇女自主的权利,她们便视外迁为逃离的坦途。

很久以来,妇女的迁移受到各种风俗的禁止,城市劳动市场的工作隔离和歧视更使女子的迁移难上加难。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妇女的独立迁移越来越多了,她们当个体户或者挣工钱,争取经济独立(参见Adepoju, 1997)。以科特迪瓦为例,尽管传统移民迁入国的经济持续下滑,该国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女移民人数却有增无减。究其原因,是因为妇女逐渐集中于非正规商业部门,这个部门相对于大多数男子(如农业劳动者、服务业的白领等)所在的工资收入部门,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小。妇女的这种迁移,切实反映了非洲家庭遭受的压力——妇女也和男子一样,迁移成了她们的生存策略。工作越来越难有保障,寄给家里的钱越来越少,许多家庭越来越依靠妇女及其农耕劳动得以支撑(Findley, 1997)。

迁移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女性移民的增加,而且她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独立迁移。国境线不能限制这种迁移:尼日利亚、加纳,甚至坦桑尼亚的一些职业妇女都在参与跨国迁移,常常把丈夫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女护士和女医生应聘到沙特阿拉伯工作,更有些人看中了美国的高工资,到

那里工作一段时间,攒下一点积蓄,缓解家里困窘的经济状况。还有些人带着孩子赴英美学习,因为尼日利亚的教育系统已经整个崩溃了(Adepoju, 1995b)。这种新现象构成撒哈拉以南非洲性别角色的一大变化。

妇女参与国际迁移,把丈夫留在家里看孩子,这种新现象标志着性别角色的转换。不久以前是只许男性家庭成员迁移。南部非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农村迁往城市,但莱索托还是个例外。莱索托男子往返于南非,女子则在家留守,保住家里的土地。男子迁往别处,掌门的男子离异或死亡,于是出现了由女子掌管的家庭和单亲家庭。这种家庭的女子既要工作又要管家,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人才流失与人才获得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就大力投资扩大高等教育,培养人力资源。尽管该地区新大学如雨后春笋,但很少有能开出研究生课程的,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尤其薄弱。近年来合格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却少有人能在大学里谋个长久的职位。于是每年有数千大学毕业生到北方国家读研究生,很多人学成之后就留在那里了。

1960年代非洲就曾发生过高技能人才流失,那时非洲国家正在史无前例地发展教育(Fadayomi, 1996)。后来的外流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乌干达的高技能人才资源流失得最多也最快,教育水平高的人和专业人员被迫向肯尼亚、南非、博茨瓦纳、欧洲和北美迁移。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的大学毕业生出于同样的原因,也纷纷到国外找工作。导致这些国家人才外流的局面——工作中得不到满足、没有奖励效率的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恶化

——波及肯尼亚,使肯尼亚大学毕业生通常要花上3年的时间才找得到一份工作。现在情况更糟糕了,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大批前往南部非洲国家,最近大多向博茨瓦纳迁移。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限制和禁止专业人员和公务员旅行,企图以此减少外流,结果未见明显成效(Oucho, 1995)。

70年代各行业资质高、经验丰富的工人和专业人员——医生、伞兵急救人员、护士、教师、讲师、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员——纷纷从津巴布韦、赞比亚、塞内加尔、加纳和乌干达流入南非共和国和非洲以外的地方。向欧洲、北美和中东产油国的流动自80年代多了起来(Adepoju, 1991a, 1991b)。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危机,每年大约有2.3万名合格的学术研究人员从非洲流失,寻求较好的工作条件。仅美国一国估计就雇用了1.2万名尼日利亚科研人员(World Bank, 1995)。经济停滞对非洲大学造成的最大冲击是高等教育拨款萎缩、科研人员工资降低、研究经费越来越少、学生的不满越来越大。

曾经是非洲劳动力输入国(加蓬和科特迪瓦)和移民目标国(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的国家,如今政治和经济都出现危机,不仅吸引不了移民,连本国公民也开始向外流动了。近年来,非洲的人才外流逐渐变成了非洲国家内部的人才交流或人才获得。主要的人才输入国有加蓬、博茨瓦纳和南非共和国(Logan, 1999)。

移民中的贩卖人口现象 青年是非洲的有生力量。未来几十年里非洲的人口将明显年轻化,如果政府不下大力气改变目前的经济形势,他们就只好在经济不稳定、困窘和匮乏中成长。两种制度都不能实现

年轻人的理想,他们烦恼不堪、左右为难,摆在面前的选择就那么几种:学一门手艺,或者种地,或者上学然后排长队找工作。大多数青年,不论是想上大学还是想挣工资,迁移的时候总是瞄准城市,再从城市到外国。这样的迁移对于少数人来说是为了混得更好,而绝大多数人则纯粹是为了生存。就说莱索托,拥有耕地的家庭屈指可数,年轻人为了找点别的工作,纷纷离开农村。他们大多去南非当了矿工。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严重挫伤了家庭满足其成员基本需求的能力。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家庭对年轻人的管束削弱了,破碎了,年轻人东游西逛,几个月连一份报酬极低的工作也找不到。他们走投无路,很多人轻而易举就上了骗子的当,在贩卖劳动力的人口贩子和冒牌公司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踏上凶险的旅程,前往北方国家寻找虚幻的绿野。

非法移民中贩卖人口的案例原来是极为罕见的,现在却呈增长趋势,因为年轻人现在为了进入欧洲,什么风险都敢冒。单个的偷渡者舍命登上驶往南欧的轮船,最近甚至上了开往东亚的船。不择手段的经纪人也从绝望的青年身上渔利,许诺将他们从西非送往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而这些青年大多数实际上只到了达喀尔;有些人即使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也是马上或不久就被发现,并被驱逐出境。1996年5月,人口贩子以待遇优厚的工作为诱饵,骗200名肯尼亚人上了钩,结果他们刚到沙特阿拉伯就给抓住了(Adepoju, 1996)。报纸上也报道过从尼日利亚东南部向赤道几内亚和加蓬贩卖儿童和少女的事件。1999年7月,一名多哥女子在向科特迪瓦的农场和种植园偷运8名儿童时被截获。尼日利亚的一条新闻列举了历年被贩卖到加蓬

的男女儿童。这篇报道说,尼日利亚移民服务局1994年3月解救了51名被运往加蓬的儿童。1996年7月,73名十几岁的少年从人口贩子手里获救。1999年8月,一艘开往加蓬的破船在途中被截获,33名儿童获救(The Guardian Newspaper, Lagos, 7, August, 1999)。

1999年5月底,数百名索马里人每人交了4000美元给骗子,企图乘船非法偷渡到澳大利亚。据报道,这些骗子中有澳大利亚人。这件事并非绝无仅有。不久,又一批索马里人乘船经也门偷渡去沙特阿拉伯,中途被截获。8月中旬,20多个青年男女在尼日利亚和贝宁边界被截获,他们身上带着假证件,打算途经摩洛哥前往西班牙。他们称每人付了7万奈拉(naira, 尼日利亚货币单位——译注)给人贩子,购买护照和证件,而尼日利亚公职人员每月最低工资仅为3000奈拉(32美元)。

1999年8月初,两名偷渡的几内亚男孩,年纪分别在14岁和15岁,身上带着一封法文信,上面写着:

大人们、先生们、欧洲的成员和官员们:我们怀着荣耀和信心给你们写这封信,向你们诉说,我们,我们这些非洲孩子,此次旅行的目的和我们遭受的苦难。我们请求你们发发慈悲,联合起来拯救非洲。救救我们,我们受尽了煎熬。救救我们——我们饱尝战乱、疾病,却吃不饱肚子。我们有学校,但没有教育,没有老师……我们非洲青年请求你们建立一个切实有效的大型组织,使非洲真正进步。我们请求你们像爱你们美丽的大陆一样爱我们的土地,像爱你们的人民、你们的家,尤其是像关怀、爱护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我们。如果你们发现我们拿生命冒险,牺牲了自己,那是因为在非洲受的苦太多了,我们需要你们为消除非洲的贫穷和战争而努力。



到莫桑比克米郎哥探亲的人们在马拉维的姆旺扎等公共汽车。Sebastiao Salgado 摄影/ Amazonas/ Contact Press Images 供稿。

信中最后一句不幸而言中。他们没能活着完成这次旅程——他们偷渡的比利时飞机到达布鲁塞尔时，人们在起落架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冻僵了、压扁了。

地区经济联盟与劳动力流动

次地区经济联盟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地区过去的单一社会颇为相似。因此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通过的第一项草案就是《人员自由往来草案》，再度开启了一个成员国公民自由往来的时代。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 1975 年成立的，旨在促进 16 个成员国之间的自由

贸易，强化生产因素的自由流动。类似的联盟还有 1964 年成立的中非海关和经济联盟，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于 1967 年建立的东非共同体 (EAC)，1976 年成立的大湖经济共同体 (CEPGL)，以及 1977 年建立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此外，1981 年建立了东部和南部非洲贸易特区 (PTA)；1994 年建立了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COMESA)，取代东部和南部非洲贸易特区；1980 年成立了南部非洲发展合作大会，后来成为南非发展共同体和非洲小岛国联盟 (又称印度洋委员会)。

这些经济联盟大多以某一个国家的经

济为主,人口也主要是向有限的几个成员国流动——南部非洲发展合作大会以南非共和国为主,中非海关和经济联盟是加蓬唱主角,在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是科特迪瓦,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尼日利亚,在大湖经济共同体则是刚果。某些地区性组织的章程里包括人员、居住和设施的自由流动,但真正实施的极少。只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广泛实行了人员的自由流动,但对居留和建业的权利则不大热心(参见 Adepouju, 1998a; Afolayan, 1998)。

地区和次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联盟可能极大地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次地区经济联盟在协议中规定了技术劳动力有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和安家立业的权利;这种联盟有利于地区内劳动力的流动,帮助该地区自力更生,寻求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整合,能够长远刺激该地区内劳动力的流动。政治长期动荡,经济贫弱破碎,在这种形势下,地区和次地区的经济组合是头等大事。2025年成立非洲共同市场的备忘录通过了,这是整个非洲走向统一的一个里程碑。由于许多国家对于自由迁徙的原则各执一说,又不愿修改国内的法律和管理办法,因此有必要协调各国与地区和次地区协议相冲突的法律。为了促进地区整合与合作,还需申明移民的安家立业权利,以及接收国的义务。

迁移的不同目标

经济局势不稳定,迁移的模式便多了起来。原先大家都往城市迁移,现在则迁往国外的越来越多。同时,全球经济下滑,以传统移民迁入国为目标的迁移受到政治和经济的种种制约,外迁者的才智受到严峻的考验,他们被迫把目光转向越来越多的其他地方(Findley, 1997)。近些年非洲

人的迁移变得越来越多样和随意;移民中许多人不再遵循老式的劳动力迁移模式,而是更广泛地寻找目的地。非洲经济局势不稳,越来越多的人采取循环的迁移方式,或者临时迁移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包括那些与迁出国没有什么政治、经济联系的国家。经济疲软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作机会减少,海湾国家便成了最吸引高技能专业人员的地方。但是这些国家近些年也出现了经济危机的迹象,结果博茨瓦纳和南非共和国又成了诱人的地方。国内经济形势不稳定,高技能专业人员被迫出国,他们发现除了欧洲、美国和海湾国家以外,新的南非共和国以及经济蓬勃兴旺的加蓬也是不错的去处(Adepouju, 1995a, 1995b)。

拿萨赫尔地区(撒哈拉南部边缘的半沙漠地区,从毛里塔尼亚到乍得——译注)来说,路线复杂、方式各异的迁移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季节性、循环性迁移模式(Findley, 1997)。人们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迁往法国、科特迪瓦和加蓬,从塞内加尔迁往法国,从埃及迁往海湾国家,又有人从邻国迁入,填补迁出的人留下的空缺。结果便出现了一种步骤性迁移模式,先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国外。这些移民学会了一套复杂的入境和找工作的策略。非洲内部的跨国迁移,在时间和目的地的选择上也灵活多了,移民们认为跨越国境与国内旅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从劳工移民到商业移民 长期以来,马里人主要是作为劳工迁移到法国,在那里做佣人。现在情况变了。很大一部分迁至科特迪瓦、法国马赛和罗马的塞内加尔人可以归入商业移民一类。大部分人在寻找原先没什么人去的目的地,这些地方与他们的祖国没有语言、文化和殖民历史的联系:先是赞比亚,后来那里的经济崩溃

了,南非共和国的种族主义政权刚倒台,人们又涌入南非。也有人去意大利、葡萄牙、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Adepoju,1995b)。

欧洲移民的处境每况愈下,当地居民和媒体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排外,反移民的政党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受欢迎,看到这种情况,一些人便远渡大西洋,到美国寻找更绿的家园,到了那里以做小买卖为主。叙费兄弟会在塞内加尔原是种花生的,那时花生是该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后来土地越来越贫瘠,这些农夫开始从塞内加尔迁出,先是去法国,80年代开始去美国,在美国经营小本商业。80年代初操法语的非洲人第一次大批涌入纽约(Enbin,1996),在街头做流动小贩,躲过城管部门的骚扰,在纽约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他们一安顿下来,就引来了其他移民。

南部非洲的诱惑 1994年南非共和国对外开放,移民立刻从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扎伊尔、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地蜂拥而至。这几个国家的一些公民早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时期就偷偷进入了南非名义上独立的居留地。那时人数不多,而且处于地下状态,大多是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教师、大学教授、医生、律师、护士和工程师。这使他们有别于来自南非周边国家如莱索托、斯威士兰、博茨瓦纳、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的移民,那些人大多是没有技术的矿工和农民。1991—1994年间,扎伊尔的商人和学生也纷纷涌入南非,他们自己的国家经济、政权和社会几近崩溃。种族主义政权倒台之后来自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国的大批移民主要是街头小贩和商人,他们企图在新共和国相对繁荣的市场上占一席之地(Bouillon,1996)。

后来,南非的黑人发火了,他们不能容

忍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当地人和一些政治家呼吁逮捕和驱逐所谓的非法移民——他们的非洲同胞,有些人的祖国曾经庇护过南非独立战士,尤其是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1994年,新政府驱逐了9.1万非法移民,大部分(75%)是莫桑比克人。其他被驱逐的人来自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这比前三年种族主义政权统治时期驱逐的非法外国人还要多得多(1990年293人,1992年83109人)。1996年,遭驱逐的非法移民由1995年的157695人上升至181230人。据估计,非法住在南非的津巴布韦人约有30万,其中每月有数千人被驱逐出境(Mfono,1998)。

1994年,政府与全国矿工工会联合发起了一些计划,先给移民工人以地区和全国的选举权,后来又给了他们公民权。9万原莫桑比克难民和12.4万自1986年就居住在南非共和国的南非发展共同体国家国民,特别是莱索托国民,获得了居留权。另有5.1万矿工获得了对《1996年外国人控制法》的豁免权(Milazi,1995)。到1999年8月底,1985—1992年间进入南非的约30万莫桑比克移民和难民获准得到永久居留权。

《国际移民绿皮书》将移民分为3类:永久性移民、技术移民和寻求庇护的难民。颁发给移民的工作许可证上规定了移民在该国停留的时间。人们责怪移民造成了本国公民的失业,给工会为合理提高工人工资的努力增加了难度;还把犯罪往移民身上推。南非的排外反应由来已久,可以一直追溯到种族主义政权统治时期生成和发展的白人与黑人间的暴力文化。由于犯罪率上升,白人纷纷迁出南非,而整个一代黑人国民没有技术时代所需要的技能,根本无法雇用,南非显然非常需要高技能专业

人员填补白人留下的空缺。目前从学校毕业的南非青年只有 7% 能找到工作, 整个劳动力中估计有 40% 的人没有工作, 他们大多数是黑人, 较 1980 年的 30% 又有所升高。多年的经济制裁导致经济增长缓慢,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就业严重萎缩。单是为学校的新毕业生创造工作机会, 就需要经济以 7% 的速度增长。理性化政策和具体就业机会的本土化, 必然减少对外国工人的需求。

博茨瓦纳现在已经成为接收移民的大国。该国经济繁荣, 政治稳定, 过去十年经济保持稳定快速的增长, 于是吸引了加纳、赞比亚、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高技能专业人员。他们大多在私营部门和大学里工作, 得益于 90 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宽松的居留和入境法律。然而就业本土化的政策一旦在教育部门实行, 就意味着要淘汰大学里的外籍人员, 外国人便没有工作保障了。

传统移民接收国的力量变化 加蓬是个小而富的国家, 国内劳动力主要由合同工和移民组成; 大部分移民来自马里、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贝宁、喀麦隆和多哥。近 1/4 挣工资的人是来自非洲和欧洲的移民。由于战乱和政治动荡, 这些年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在不正常情况下从布隆迪、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到加蓬找工作, 希望日子能好一点, 保障能多一点。然而失业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经济活跃的人口失业率达到 20% 左右, 政府赶忙制定了就业机会本土化的政策。1991 年发布了总统令, 针对城市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 总统令规定要保障国民的就业机会。1994 年 9 月, 政府为了实施劳动力“加蓬化”的政策, 颁布了法律, 要求外国人注册登记, 并交纳居留费, 否则须于 1995

年 2 月之前离境。期限到达, 约 5.5 万外国国民被驱逐出境, 1.5 万人取得合法居留权 (Le Courier, 1997)。

科特迪瓦由于其富饶的自然资源, 多样的出口农业和种植经济, 一直吸引着该地区的移民。科特迪瓦本国劳动力不多, 大约 1/4 挣工资的劳动力是外国人。该国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根本不把殖民国家随意划定的国界放在眼里, 鼓励周边穷国向科特迪瓦移民。来自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利亚、利比亚、塞内加尔和加纳的移民悄悄潜入, 遍布科特迪瓦的种植园, 或者到人家帮佣, 这是本国人看不上工作, 1965 年移民占科特迪瓦全国人口的 17%, 1975 年占 22%, 1988 年占 28%, 1993 年占 25%。到 1995 年, 科特迪瓦的 1400 万人口中, 有 400 万是移民 (Toure, 1998)。接着, 经济滑坡, 本国年轻人失业率上升, 政府根据这一情况制定了新政策, 开始对外国人进行登记, 给他们发特别身份证; 人们普遍认为将来的趋势是驱逐非法移民 (以现在的划分为标准)。

难民 非洲难民数目庞大, 成因复杂, 其处境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人间悲剧。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穷的地区, 那里的难民从最不发达的国家流落到同样不发达的国家, 到处是饥荒、战乱、干旱和政治动荡。撒哈拉以南非洲 17 个国家饱受内战的蹂躏, 产生了 600 多万难民, 另有 1700 万人在本国流离失所 (Adepoju, 1999)。

这一地区的难民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流动快, 难以预测: 产生难民的老问题, 例如莫桑比克的问题刚刚解决, 新问题又冒出来加重难民危机, 如利比里亚、卢旺达、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等国的问题。第二, 那些产生大批难民的国家, 同时也为邻国的难民提供避难。这些难民通常来自

最贫穷的地方,逃难又逃到同一地区同样贫穷的国家。所有的难民实际上都被困在这一地区,首先向他们伸出援手的,还是他们的非洲同胞——这一过程是由难民和避难国人民之间的种族和家族联系决定的。这种代代相传的热情好客习性,如今已经不堪重负了。

过去数年又出现了新的难民国家(利比里亚、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卢旺达近来的野蛮屠杀和似乎是有组织的种族灭绝,使那里难民的处境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据估计,约有100万卢旺达难民进入了扎伊尔、坦桑尼亚甚至布隆迪各地。传统的难民发源地——厄立特里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仍在成千上万地制造难民。马拉维一穷二白,却是最大的难民接收国之一,从莫桑比克接收了91万难民(占其人口的1/10)。

寻求避难所的人并不总是跨越国界:许多人为了逃避迫害和暴力、自然灾害、干旱、生态问题和内战,虽没出国,却也流离失所。这些人里有儿童、妇女和老人,大多来自农村。

新世纪展望

许多因素表明,新世纪里撒哈拉以南非洲外迁移民可能增加。随着政治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重,难民和非法移民的数量和影响都将扩大。结构调整和目前的经济滑坡也将加速人口外迁。该地区将有更多非正常移民。贫困、失业和社会经济缺乏保障日益深重,国内移民中的一部分可能先成为城市地区的移居者,然后成为非法移民,跨越国境进入相对繁荣的国家。

经济的复苏、生活水平的提高、穷人的生存,关键在于疗治当下的经济弊病,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尤其如此;否则,有效、可持续的发展就只是水月镜花。但是这个目标尚遥遥无期。在战乱中不可能出现有意义的发展。经验向该地区的许多国家表明,没有和平与稳定,就不能吸引投资,只会导致资本外逃;经济单一只会导致人口以各种方式外迁,不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

阻止人口外流有一个老生常谈的办法,值得一提再提:帮助穷国发展国内就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连年困难,移民人数于是增加,北方国家与这一地区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更使人趋之若鹜,入境条件和入境控制再严格,也无济于事。经验表明,凡有这种巨大差别的地方,移民潮——正常移民和呈增长趋势的非正常移民——总是从穷国流向富国。就拿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南非共和国的人均收入数倍于莫桑比克,尽管两国的国境线上拦了电网,仍有非法移民拼着性命也要进入南非。

上文提到最近发生的那两个男孩的惨剧,说明非洲贫穷国家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利时外交部长读了那封信深受感动,说要把这封信送给欧洲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看。比利时合作与发展部部长说,这封信“证实了许多非洲青年的惨痛处境”。内务部长说,“这是感人至深的请求,请求我们对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男女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比利时政府出资运回两名男孩的遗体,他们在科纳克里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Guardian Newspaper, Lagos, 5, August, 1999)。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经济和政治局势表明,如果失业、不平等和贫穷继续恶化,未来几年那里的移民可能继续增加。由于公共部门和正规私营部门大量裁员,非正规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如何为上百万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提供生产就业机会,这是新千年里最大的挑战。这些年轻人不是混战一场争夺正规部门的工作,就是加入越来越长的外迁行列,随时准备偷越国境,随便什么地方都去,随便什么杂活都干,只是离自己的祖国越来越远。在莱索托那样的国家,要加强男孩子的教育。那里的人向来把女孩留在学校读书,而让男孩准备当矿工。现在情况变了,南非不需要那么多非技术男性劳动力了。

由于移民迁入国经济条件恶化,本国公民失业率上升,移民便成为驱逐的对象。近几个月加蓬和南非共和国已经开始收容和驱逐非法移民。偷渡客便想办法通过中间国家前往新的目的地——南欧、美国、中东和亚洲。非洲国家应该多向公民宣传关于国外入境、居留和就业的规定和规章。塞内加尔和马里就在处理移民事务的相关

部门开设了信息和咨询部,这种做法值得效仿。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数国的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恶化,下一个十年中正常和非正常的劳工移民人数会更多。同样,人才交流和妇女迁移也将加速从贫穷国家向该地区富裕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流动,尤其是加蓬、博茨瓦纳和南非共和国。政局不稳、民族冲突和内战也将产生大批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然而,加纳和乌干达政治和经济氛围好转,于是吸引了外迁人口的回转和新移民迁入。尼日利亚复苏经济、稳定政局的努力也有了成效,专业人员和逃避独裁军事政权的避难者开始回流。其他国家应以此为榜样。

[黄 觉译]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ADEBEH, A. (Ed). 1999. *Comprehending and Mastering African Conflicts: the Search for Sustainable Peace and Good Govern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ADEKANYE, J. BAYO. 1998. 'Conflicts, Loss of State Capacities

and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Appleyard, R. (ed.), *Emigration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ume 1: Sub-Saharan Africa*. Sydney: Ashgate.

ADEPOJU, A. 1983. 'Undocumented migration in Africa: trends and

polic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26, No. 2.

ADEPOJU, A. 1991a. 'South-North migration: the African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29, No. 2.

ADEPOJU, A. 1991b. 'Bi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labour circulation

-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Papademetriou, D. G. and Martin, P. L. (eds) *The Unsettled Relationship: Labour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ADEPOJU, A. 1995a.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post-colonial Africa' in Cohen, R. (ed.) *The Cambridge 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DEPOJU, A. 1995b. 'Emigration dynamics in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pecial Issue: Emigration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33 nos 3/4.
- ADEPOJU, A. 1996. 'The links between intra-continental and inter-continental migration to and from Africa' in Adepoju, A. and T. Hammar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and from Africa: Dimension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PHRDA, Dakar and CEIFO, Stockholm.
- ADEPOJU, A. (ed.) 1997. *Famil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
- ADEPOJU, A. 1998a. 'The role of regional economic communities in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in African countries' in *Migration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Rome: The Vatican.
- ADEPOJU, A. 1998b. 'Emigration Dynamics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Appleyard, R. (ed.) *Emigration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1: Sub-Saharan Africa*. Sydney: Ashgate.
- AFOLAYAN, A. A. 1998. 'Regional integration, labour mobility, clandestine labour migration and expulsion of illegal immigra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gional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frica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Gaborone, June 2-5.
- BOUILLON, A. 1996. 'La Nouvelle Migration Africaine en Afrique du Sud. Immigrants d'Afrique Occidentale et Centrale à Joannesburg'. Paper presented at Colloque Systèmes et Dynamiques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Ouest-Africaines, IFAN/OSTORM, Dakar, 3-6 December.
- CORDELL, D. D., GREGORY, J. W. and PICHE, V. 1996. *Hoe and Wage: A Social History of a Circular Migration System in West Af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EBIN, V. 1996. 'Negociations et appropriations: les revendications des migrants senegalais à New York'. Paper presented at Colloque Systèmes et Dynamiques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Ouest-Africaines, IFAN/OSTORM, Dakar, 3-6 December.
- FADAYOMI, T. O. 1996. 'Brain drain and brain gain in Africa; causes, dimens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Adepoju, A. and T. Hammar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nd from Africa: Dimension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Dakar: PHRDA and CEIFO, Stockholm.
- FINDLEY, S. 1997. 'Migration and family interactions in Africa' in Adepoju, A. (ed.) *Famil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
- FINDLEY, F., TRAORE, S., OUEDRAOGO, D. and DIARRA, S. 1995. 'Emigration from the Sahe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pecial Issue: Emigration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33 nos. 3/4.
- ILO Newsletter*, no. 2, February, 1995.
- Le Courier* (ACP) Reportage. 1997: Gabon No. 165, Septembre-Octobre.
- LOGAN, B. L. 1999. 'The revers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from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7, no. 2.
- MFONO, Z. N. 199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South Africa in the 1990s' Migration Country Profile presented at the UNESCO/MOST Regional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frica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XXI Century. Gaborone, 2-5 June.
- MILAZI, D. 1995. 'Emigration dynamics in Southern Afric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pecial Issue: Emigration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33 nos. 3/4.
- OUCO, J. O. 1995. 'Emigration dynamics of Eastern Africa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pecial Issue: Emigration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33 nos. 3/4.
- SCHMEIDL, S. 1996. 'Hard times in countries of origin'. in *Migration and Crime*. Milan: ISPAC.
- TOURE, M. 1998. 'Country Paper: Côte d'Ivoire' Migration Country Profile presented at the UNESCO/MOST Regional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frica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XXI Century. Gaborone, 2-5 June.
- UNITED NATIONS. 1996.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Wide Special Initiative on Africa*. New York: UN.
- WORLD BANK. 1995. 'Rethinking Teaching Capacity in African Universit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Working Group o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donors to African Education in 1993'. Findings, African Region, No. 33. May.

三种巨大的、出乎意料的移民运动出现在该地区:第一种,在该地区内部前所未有的跨国人口流动;第二种,地区外人员入境;第三种,过境前往西方的过境移民。这三种现象对正经历移民潮的这些国家有着直接的、有时是重大的影响,激发了它们政治上的特殊反应。

[祝东力译]

独联体近期移民趋势

詹娜·扎扬柯夫斯卡娅

本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了前苏联在90年代初解体之后独联体(CIS)移民模式的变化,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本文内容不仅包括独联体各国之间的迁移,而且包括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迁移。本文特别关注俄罗斯族和其他族群的回归、难民和流民的被迫迁移、劳工移民流、非常规移民,以及被逐民族的回归等等。

[李存山译]

从土耳其的过境移民

看国际移民体制的政治学

阿赫梅特·伊斯杜伊古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移民一直是西欧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的显著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过境移民和难民庇护成为主要的迁移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本文以此为背景,对土耳其境内的过境移民和难民群进行了考察,对土耳其与欧洲之间形成迁移、庇护和难民体制的更广阔的背景进行了评价,并将过境移民问题同正在发展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本文还对过境移民与国际移民政治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为此而认真考察了国

际移民体制的政治方面。“体制”一词可宽泛地解释为一定利益运作并能够分配权力和利弊的一种规范系统。文章认为,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已经对国际移民活动在一种国际规范系统内的扩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大川译]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罗纳德·斯凯尔顿

本文在叙述了古代亚太地区的人口流动现象后,主要关注近半个世纪的移民状况。移民的原因被归结为四种:目标国的移民入境政策;外部强权的干预;中东的发展;以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自身的经济开发。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讨论了最近以来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当前,亚洲移民的问题主要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受到挑战以及跨国社群的出现,还有非法移民也是亚洲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情况表明,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对该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甚微,跨国移民将继续成为亚太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

[祝东力译]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

及最新趋势

阿得兰提·阿得泊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迁移具有多种形态,最常见的是地区内迁移,这些移民包括移民工人、非法移民、游牧民、边境工人、难民和高技能专业人员。由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恶化,迁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非正常迁移增加、迁移路线多样化,移民中出现贩卖人口的现象。男性的迁移有选择且得到资助,女性自主迁

移越来越多,表明迁移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地区内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尤其是流向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地区;劳工移民日益为商业移民所取代。由于北方国家移民法越来越严格,移民们开始在本地区寻找去处。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低靡、战乱、政局不稳、贫困蔓延和失业增加,都表明未来几年移民,包括难民,可能继续增加。如果齐心协力协调国家法律和地区、次地区协议,次地区经济联盟有可能促进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

[黄 觉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动向 阿德拉 佩勒格里诺

本文考察了近几十年的国际移民动向,强调了拉美次大陆在以往 50 年间移民过程的特别之处。本文论述了拉美地区内移民运动的主要特点,以及 20 世纪后半叶的一大景观,即愈来愈多的移民流向美国。最后,作者探讨了国际移民的增加同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政治暴力对移民的影响,以及作为移民之首要原因的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

[李存山译]

NAFTA 体系下的国际移民和劳动力 灵活性

亚利山得罗·卡那勒斯

本文为探讨 NAFTA 体系下经济一体化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移民的规模、成分和形式可能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我们以为,对移民的可能影响,不来自 NAFTA 之中,而是来自其背后的生产运作的变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劳动力灵活性策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而新形式的移民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无论是墨西哥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美国实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都在经济和产业的日益一体化进程中,推动了两国间贸易关系的重组。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美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更取决于各国以及共同体内工作过程之间、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而非一体化进程本身。

自 NAFTA 之中,而是来自其背后的生产运作的变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劳动力灵活性策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而新形式的移民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无论是墨西哥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美国实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都在经济和产业的日益一体化进程中,推动了两国间贸易关系的重组。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美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更取决于各国以及共同体内工作过程之间、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而非一体化进程本身。

[王 佩译]

国际移民、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 劳尔·乌尔苏亚

社会科学若要在制订国际移民政策方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需面对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的这一新任务牵涉到两大过程:一是全球化;二是人权之在全球获得普遍承认。两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政策的抉择产生影响。新近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有人认为自南向北的迁移与贫困直接相关,许多政策建议也源于这一认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作者指出,政策建议和研究发现相矛盾,因为移民政策倚重经济理论。但经济学其实并未虑及相关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复杂性质,而这些因素当然也影响到移民的动机和迁徙过程。故而作者提出组织多学科的理论研究,认为这应当有助于设计较为有效的政策。本文也主张区分知识的概念性应用和工具性应用。

[陈 思译]